

追憶俞鴻鈞先生

王紹齋

芍藥花開出舊闌，青衫掩淚再來看，主人不在花尚在，更勝青松守歲寒。

（唐·錢起詩）

俞鴻鈞先生歿于民國四十九年六月一日，享年六十四歲，他逝世已逾十六年了。今年一月卅日（農曆十二月十二日）是他八十歲冥誕。筆者在過去十六年中，每逢農曆十二月十二日暨國曆六月一日均必先赴陽明山俞先生的墓園致敬，然後再到中山北路他的故居憑弔一番，惟一入大門，庭園景物依舊，而人事已非，不免感慨系之，坐在他客廳中回想過去的「一切」，猶一幕一幕的出現在我腦海中。

上海市府秘書科長

我得識俞先生係在民國十六年冬，張定璠先生初接任上海市長之後，當時周雍能先生任秘書長，俞先生係周秘書長舊友，被邀担任英文祕書，並兼宣傳科長，我原在周雍能先生任安徽財政廳長時在財廳任職，旋因唐生智反叛中央，出兵安徽佔領了安慶，我由安慶逃往漢口轉回到江西南昌，聽到老長官周先生在上海市府任職，即約同周先生舊部數人投奔上海，惟當時江西在共匪騷亂中，南潯鐵路被共匪控制，郭沫



○ 蔣公與俞鴻鈞先生(右)蔣經國先生(左)合影

若坐守九江，檢查蒸餾，不易通行，只得由鄱陽轉德安步行至玉山入浙江開化，再乘小船到杭州，旅行月餘始抵滬，到滬後被派在市府第一科任監印職務，我係單身，住在楓林橋市府樓上後面一間小屋中，樓下即係宣傳科辦公室，我經常去該科找一班年青同事坐談，是時俞先生亦不過三十零歲，喜與青年同事接近，當時我對他的印象是一位翩翩公子，鼻梁金邊眼鏡，西裝畢挺，有時着長袍，和藹可親，說上海話和國語都帶些廣東音調，他上下班自己駕駛他私人棚式小汽車，生活似頗舒適。有時他會用他的小棚車載我們去兜風，而且請客吃廣東小館，談談上海掌故等，因此我們彼此有了相當認識，他那時住在施高塔路一幢小洋房內，記得他首次帶我到他家晚餐，介紹他的夫人和三位女公子和我認識，他的長女公子僅九歲，次女公子六歲，最小女公子三歲，並且令最幼女公子表演彈鋼琴。如今她們都已子女成行，且多已婚配生孫，這證明我是應該老了，毋怪住在我樓上的小太保因我叫他不要在上面淋水，他要罵我「老不死」呀！一笑！

尊翁軼事別有卓見

俞先生家道小康，他的尊翁庭柱先生在上海經營豬鬃廠，係專門出口銷外國的，他老先生在上海商界廣幫中亦屬知名人物，他逝世以後，並沒有遺留下大宗財物，却有兩件事我聽了留下深刻的印象。其一，是他曾娶有兩位侍妾，他在未死之前，已為兩位侍妾在蘇州及杭州兩地分購寺院一座，他逝世後，兩位侍



。影留者記外中待招（者圖地指報教持手）生先鈞鴻俞，發爆爭戰日中三一八

妾分赴蘇、杭出家修道，不留絲毫贅疣于子孫，此種作風，堪稱一絕。

談到過去粵商在滬娶侍妾事，當時在上海極爲普遍，如俞先生的父執、粵籍富商陳炳謙先生，是上海祥茂洋行的買辦，他娶有十位侍妾，都住在海格路澄廬別墅內，記得某次宴會中，杜月笙曾親口笑問陳先生道：「你娶了十位太太，而且能住在一起，真是了不起，請教有何祕訣？」陳先生答說：「很簡單，我尊重太太爲至上，由她將這班侍妾如同管教女兒一樣管教，一切事都容易解決了。」可見此老頗有辦法。惟時代進步，我想此老如在今日亦無法享此豔福了。其次俞老先生還有一句遺言留給俞先生：「外行生意絕不可做，內行生意如無權不可參與。」俞鴻鈞先生將此言終身奉爲圭臬，俞先生一生雖未經商，但他常將俞老先生的話規勸親友。俞老先生雖屬商人，而他的真知卓見却令人佩服，決非等閑人物。

審核賽馬支出往事

我在上海市府監印不久，周雅能祕書長鑑於所屬各局每月送到支出計算書據堆積如山，無人過問，特派我和第二科科員竇孟幹、劉振華三人組織審計小組，擔任審閱工作。當我開始審核財政局所送賽馬支出計算當時，發現一月舉行數次賽馬，財政局只派二、三人前往收稅，而每次該局竟報銷數千元，審核其所送單據內容：大都是購中西筆墨紙張十數打，茶葉數十斤，毛巾數十打等，使我們大爲驚奇！竇、劉兩位同事年事稍長，世故較深，認爲不如馬虎了事，我當時少年氣盛，所謂初生之犢不畏虎，力主予以揭發，

否則有虧職守。當時財政局長爲王和先生，他是國民革命軍東路軍白總司令崇禧麾下的要員，主辦科長曾某又是王局長的親信，竇、劉兩君均不欲開罪於他們，於是推我主簽，我以稍帶諷刺滑稽口吻簽註：「查核財局每次賽馬只派二、三人去收稅，如果手足並用，亦不需許多筆墨紙張，暨如許茶水毛巾，如果要招待觀客又嫌太少，同人百思不解，函請轉飭財局答復。」劉君不但肯蓋章，且回到二科去簽辭兼職，竇君則勉強蓋了章，我却不顧一切立即送呈周祕書長核閱，周祕書長看到後大爲震怒，認爲應予整飭。旋經提出市政會議，王局長亦遭到各局長的責難，最後補救辦法：是既往不咎，立即在市府設立第四科，主辦審計事項，派費紹宏先生爲第四科長，調派我在第四科任審計股長，俞鴻鈞先生的宣傳科改稱第五科，俞先生於審核賽馬支出一案，對我極爲贊許，認爲我辦事認真，而且有革命的勇氣。

我在第四科任職時，曾協助費科長撰擬會計規程，建立會計制度，並將各局處舊式賬簿改爲新式賬冊，以便審核而杜絕浪費。旋因桂系反叛中央，張定璠市長因病辭職，財政局王局長亦辭，由周雍能祕書長代理市長，派俞先生代理財政局長。張定璠市長辭職獲准，中央派張羣先生繼任市長後，俞鴻鈞先生奉調回市府任參事兼預算委員會主任委員。我當時是編審預算的主辦人，於是我和俞先生接觸的時間更多了，他所需的一切資料報告均係我代他準備，因此他對我更有深一層的認識。

從代祕書長到市長

民國十九年馮、閻聯合汪精衛在北平與中央對抗，上海市政府兼秘書長潘公展遠走日本，遲遲不歸，張羣市長改派俞鴻鈞先生代理秘書長，我奉派在秘書長室代他核閱文稿，但仍兼第四科職務，直到張羣市長辭職，中央派吳鐵城先生繼任上海市長，俞先生真除秘書長，我亦被升調爲秘書離開第四科辦公室，專在秘書長室辦公，旋吳鐵城先生調任廣東省政府主席，俞鴻鈞先生奉命代理市長，我又兼任第一科科長，八一三中日戰爭發生後，上海淪陷，俞先生赴港，仍留我駐在上海，因戰爭結束時由南市撤退入法租界的保安團隊等官兵數萬人，留在法租界集中營，他們所有給養，都由我向中央政府領取轉發，故法租界當局對我保護周密，二年後汪精衛的奸黨到達上海，黨部大部份人員被其吸收，我在上海已無法藏身，當時集中營官兵已經法租界當局陸續釋放，所餘無幾，我乃奉准離滬赴港。綜計我與俞先生在上海共同工作足有十年之久。

上海淪陷後，俞先生在香港與我通訊，係化名「李聰」，據他告訴我：「他母親姓李」，所以用李聰之名，意在紀念母親。我則用筆名「王魯」，這是我早年投稿的化名，我離滬以後，留在上海的同事與我通訊，仍用此名，不料早引起了日方的注意，太平洋戰事爆發，日軍進佔法租界，即以「王魯間諜案」將留駐上海同事周松鶴、周國屏兩君捉拿去審問，並查抄他們的家財，查封我和他們在上海淪陷後合資所創辦的「強華針織廠」；最後兩位周君幸經當時投偽的同事保釋，而強華廠則被迫封閉拍賣，個人損失不貲。

一生機遇憑藉才能

俞鴻鈞先生一生做事，完全靠他自己的才華和努力，他既無奧援，亦無政治背景，他自聖約翰大學畢業後，即在該校擔任教職，旋被介紹入英文報任編輯，爲陳友仁所賞識。鼎革以後，曾隨陳友仁赴漢任外交部祕書，因不滿漢口共匪作爲，辭職回滬，由周雍能先生引薦入上海市政府，先後爲張定璠、張羣、吳鐵城三位市長所倚重；初任英文祕書兼宣傳科長、代理財政局長，後調參事、代理祕書長，吳鐵城市長甫到任即派他爲祕書長，其實他和這三位市長均素不相識，更談不到有何淵源，都是他的才華表現和平日工作努力以及外界對他的讚許，獲得長官的重用。

俞先生在吳鐵城市長任內因負責辦理一二八中日停戰交涉有功，曾蒙中央召見到過南京一次，是後即從未去過南京，吳鐵老在上海五年，除重大事件親自處理外，一切均交俞先生全權辦理，推心置腹，信任有加。鐵老奉調赴粵，力保俞先生代理上海市長，即獲中央核准。俞先生在代理市長期間，適蔣委員長介公在上海醫牙，委員長每日四時左右必電話召俞代市長往官邸茶敘，談話內容除垂詢上海市政建設情形外，諸凡政治、外交以及國際大勢無不涉及，因此復蒙委員長所賞識。一個月後，委員長牙疾痊愈回京，即發表俞代市長真除市長。俞先生除前次曾入京見過蔣委員長後，即未曾晉謁過，此次機遇，固然是他的才華蒙委座賞識，亦好似機緣自有定數。

志在外交卻入財政



任上海市政府秘書長時的俞鴻鈞先生

追憶俞鴻鈞先生

俞先生性好騎馬，騎術亦精，惟他任上海市長時，因坐騎受驚，不慎由馬上摔下，跌斷左腕，經醫院照X光片，認為骨碎必須住院上石膏休養，俞先生因當時中日交涉情勢緊急，不容個人住院休息，經赴上海著名跌打醫生張德興處求治，張醫師立即予他敷藥，認為無須住院，俞先生仍每日到府辦公，張醫師則每日來市府換藥，經月餘的治療，果然痊愈，再赴醫院照X光，據告臂已復原狀。俞先生不顧個人傷勢，努力奉公，重視職守的精神，張醫師亦為之感動，拒收一切醫藥費用，是後只得製匾酬謝，以示崇敬。

民國廿六年日本在上海掀起了八一三戰事，俞先生在外交上表現極為優異，曾予日人重大的打擊，博得國際人士的同情，因此爲宋子文先生所賞識，以後宋先生在重慶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時，曾發表他爲政務次長，此是後話。上海陷敵以後，俞先生赴港轉飛漢口晉謁蔣委員長，報告一切，當時奉命暫回港待命，旋奉派爲中央信託局常務理事，該局理事長是孔祥熙先生兼，局長是葉琢堂先生，俞先生駐港辦公，事實上係辦理對港府交涉事宜，港府當局因俞先生在上海的聲譽甚佳，對他極爲禮遇，當時凡中央駐港各機關辦事處或代表等與重慶拍發密電，必須用俞先生名義和簽字，來電亦只能拍給俞先生譯轉，方可不受檢查。俞先生辦公室所有各機關的密電本堆積如山。俞先生被調財政部政務次長赴重慶就職後，此項任務即交給我在港代他繼續辦理，太平洋戰爭爆發時，中信局在港所租匯豐大樓二樓全部辦公室被港府征用，禁止一切人等出入，但俞先生原有一間辦公室却未被征用，並承港府發給我特別出入證一張，我每日照常去匯豐大樓收轉電報，可見港府對俞先生尊重的一班，直到香港淪陷前夕，我始將全部密本攜出銷燬。

在香港工作的貢獻

俞鴻鈞先生在港還替中信局辦通一件大事，當時中信局一班青年同事公餘之暇，在港組織了一個俱樂部，名爲「南尖社」，南尖社在室內裝設了無線電收發報機一座，事前未報港府允准，且平時出入的人很多，引起了港警的注意，某日港警入內檢查，發覺了無線電收發報機，大爲震驚，檢查人員又將「南尖社



：。隊部安保閱檢同陪（左）將上緝孟彭令司副由，令司安保兼席主府政省灣台任出鈞鴻俞

追憶俞鴻鈞先生

「譯爲英文，讀音和「納粹」相似，其時正是英人與納粹德國作殊死戰的時候，港府得知港地有「納粹」的組織，竟小題大作，除封閉現場外，還要捉拿主犯，並開出名單數十人要驅逐出境，這些名單大部份都是中信局駐港人員，一旦被執行，中信局駐港辦公處將全部解體，後經俞先生出面與港府交涉，解釋「南尖社」的性質並非納粹的組織，但爲顧全港府的威信，答應撤退主要人員二、三人，因港府信任俞先生，方始大事化小，了結了這場公案。

俞先生在港時一度曾奉中央電告，擬派他爲廣東第四戰區的祕書長，俞先生以不諳軍事婉辭了；旋又奉外交部宋部長派爲政務次長，他對外交素感興趣，故當即摒擋一切赴渝就任，不料甫抵重慶，財政部孔部長又發表他爲財政部政務次長，使他感到左右爲難，因俞先生與孔、宋之間均無甚淵源，殊難抉擇而開罪任何一方。最後只得晉謁蔣委員長請示，奉蔣委員長核定就任財政部政務次長職務，其實與他所抱初衷違背，既蒙委座決定祇得服從，當時俞先生對財政可以說是外行，我記得他事後會將經過詳細情形長函告我說：「目前是過着學徒生活，一切都需從頭學起」，他囑我在港收購有關財經書籍寄渝參考。此係俞先生踏入財經界的開始，他當年絕未想到從此他會在財經界消耗了他半生的心血和寶貴的光陰。

黃炎培的狐狸尾巴

俞先生任財政部政次時，重慶國民參政會的份子包括各黨各派，魚龍混雜，尤其是沈君儒、黃炎培這班

老狐狸，專門找政府差錯，孔部長更是他們最大的攻擊目標，但孔部長高高在上，從不出席參政會，向由俞先生代表出席，於是他首當其衝，幸他人緣甚佳，尤其能言善辯，每次都能順利完成任務。其時有一有趣的故事值得在此一提，參政員黃炎培這隻老狐狸與俞先生連絡得很好，每次在參政會開會前夕，他必親來財部走訪俞先生，密告開會時的質詢內容，俾俞先生可先作準備，在他走後，俞先生對我說：「剛才漢奸來過了」，並作會心的微笑！以此一端，可證明黃炎培的雙重人格。

俞先生聰慧過人，又肯虛心學習，做事腳踏實地，從不吹牛拍馬，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長處，他能成爲中國財經專家，完全靠虛心學習，實非偶然。他初長財部時，本想有一番大大的作爲，尤其力主改變過去財部的官僚作風，無奈環境不許可，各方牽制太大，消沉了他的壯志，幸而領袖始終支持他、愛護他，使他仍能繼續奮鬥，至死不渝。

上海陷匪前夕祕辛

俞先生一生忠于黨國，服膺領袖，記得在上海未淪陷于共匪的前夕，蔣總統引退離京，他亦將交卸中央銀行總裁職務時，袁良曾派其姪袁省廬君（原任市府科長）專程晉見俞先生，勸他不要離開上海，對方有意借重云，俞先生當場即堅決拒絕，並說「我此生絕不做對不起領袖的事」，可見他對於領袖的忠誠。那時袁良與李濟琛等正在上海搞第三勢力，袁省廬之弟袁君實又是老共幹，潛伏於中央銀行業務局任副

主任，共匪佔領上海後，他由地下鑽出來，任接收央行的軍方副代表，以後袁良等似乎也沒有搞出什麼名堂來，聞業已物故，他的姪兒袁省廬亦久未聞其名，可能早已被鬥垮了。

俞先生離滬到港，不久即奉蔣總統電召來台，先後出任財政部長、台灣省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等要職，在此過程中，自不免遭到些挫折，當時他難免有些氣餒，但他問心無愧，總統亦深了解他的爲人，一經撫慰，他又心平氣和的恢復往日工作熱忱了。

氣喘病引發心臟病

俞先生的氣喘病的起源，據他親自告訴我起自他父親逝世後，他繼續主持豬鬃廠，可能是廠中空氣污染所致，早年身體強健，抵抗力強，很少發病。在上海十年中，雖時有小病，但休息一、二日即愈，在港時曾發過一次，比較嚴重，曾住院數日，當時有一種德國藥，名「麻黃素」，治氣喘有特效，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後，香港禁止德國藥進口，我曾託上海的朋友在上海四川路一帶日本藥房收購了許多寄港備用，他在重慶也是靠此種藥維持，是後體力漸衰，病情又加劇，此藥已失效，幸勝利後，各國新藥甚多，效力亦大，但副作用亦大，尤其是會影響心臟，記得有一次我在他書房與他閑談時，他打開書桌抽屜指給我看，全抽屜都是治氣喘新藥，他對我解釋說：某種新藥效用特佳，但影響心臟甚巨，他服此藥等於慢性自殺。我聽到這番話，看他無可奈何的表情，我心裏非常難過，但又無適當言詞可以安慰他，不幸果然爲他自己

所料，是死于心臟病。

俞先生從政，實踐崇法務實的信條，他個人的私生活，尤其樸實無華，他任上海市長時住的是他私人的兆豐別墅內一幢兩層樓洋房，他在重慶任次長時住在七星崗王園內樓下兩間房屋，他升任了部長，還是住在原處，他來台灣後住在中山北路中央銀行一幢日式樓房內，他做了省主席和行政院長後，仍住在原處，幾次有人建議他遷居一間較大房屋，他都認為無此必要。警務機關擬在他門前設崗，以資保護，亦被他嚴詞拒絕，他坐的汽車內始終只有司機一人，從未增加保鏢副官一類人物，一切仍和平常一樣，此種平實作風，在官場中尙屬罕見。

知遇之交誼兼師友

我與俞先生的交誼，亦師亦友，情逾手足，平時無話不談，個人生活尤蒙關切，他深了解我的個性，我的工作都是他自動代我安排，我從未向他有所要求，最後我來台灣，正值央行人事凍結的時候，他仍設法爲我安排在某一附屬機構中任一閑職，待遇尙足溫飽。我以逃難餘生，不欲追求名利，更無意入政治旋渦，故他迭次躍上政治舞台，我均未參與，他却一直認爲我的生活過於閑散，最後他將我介紹於某地方金融機構，原期有較高職位，但結果只發表祕書一職，他對我說：「這未免對你太委屈了，你幹了半輩子的祕書，算了吧！不要去，我另想辦法。」我因爲不想再麻煩他，我說商業機構裏名義無所謂，憑我個人的

能力去試試看吧！因俞先生雖迭居高位，但他從不肯向下施壓力的。平時我夫婦倆每逢星期日，多去他公館晚餐，如果有幾星期未去，他便會單獨來我家探視。我到某金融機構後，承當局信賴，迭蒙擢升，直至適齡退休，仍承留置為備員，足以告慰老友在天之靈。

寬厚待人終受委曲

俞先生平時待部屬和藹寬厚，我從未見他疾言厲色對待任何人，他在上海市府祕書長時期，有科員陳某，不知爲了何事對他不滿，常常對人批評他，他從不與其計較，他代理市長後，仍升陳某爲祕書，當時不但同事中感到意外，陳某亦感慚愧，從此化敵爲友。他在財部次長任內，祕書黃某偷偷地用他的名義寫信並蓋他私章介紹朋友于附屬機關工作，事後該機關主管來部面陳安置情形，他方知悉，但他並未對黃某深責，亦未將印章收回。其他尚有類似情形甚多，因篇幅所限不多贅。他對於司機工友亦同樣的很客氣，這是他的長處，可能也是他的弱點，後來發生公館內工友向央行爛領柴炭事件，引起監察機關的糾舉，其實俞先生終日繁忙，同時因健康不佳，每日回家後已精疲力盡，那有閒情去過問那些小事，這責任應該是央行主管人員的，而加罪於他未免冤屈。提到那個川娃兒工友，係由重慶跟隨來台，人頗聰敏乖巧，俞先生夫婦都很喜歡他，惜未受多少教育，不知利害致出此差錯，事後亦未加以處分，俞先生個人竟承擔了一切責任，但他內心不免受了些創傷。

家庭美滿積有餘慶

俞先生家庭生活美滿，夫人梁就光女士係上海著名女校——聖瑪琍亞書院畢業，該書院與聖約翰僅一牆之隔，他倆係自由戀愛而結婚，伉儷情深，數十年如一日，俞夫人係虔誠基督徒，主持家務，有條不紊，且從不過問政治，教育子女，寬嚴互濟，長女公子筱鈞，戰後畢業於聖瑪琍亞女校，上海初次創辦學生集中軍訓時，租界內學校係自由參加，並未硬性規定，而聖瑪琍女校曾選派筱鈞等數十人參加，筱鈞小姐本可以種種原因請免訓，但俞先生以為他是市長，他的女兒不參加，何以服衆，一定要她參加受訓。受訓結業後，舉行結業閱兵式由市長檢閱，俞夫人亦親往參觀，她看到她的女公子身着軍服，肩荷步槍於正步經過檢閱台時，她輕輕地問我：「她們荷着的槍有多重？」我說：「大約七斤至九斤之間。」（因當時的槍種類甚雜，有漢陽造，有三八式等輕重不一），俞夫人聽後說：「陰功呀！」（廣東話難為她們之意）充分表現母愛之深。筱鈞旋在重慶中央大學畢業，後又在菲進修得博士學位。她作事頗有父風。次女公子筱梅在港鋼琴比賽曾得優勝獎，旋畢業於重慶藝專音樂系，後再赴美深造，三女公子筱璉在美專習美術裝璜佈置，三人均受了高等教育，渠等均係自由戀愛而結婚，俞先生夫婦從未加以干預，婚後均極美滿，且均兒女成行。

數十年的時間瞬息的過去了，關於俞先生的事跡委實罄竹難書，單以我留滬及留港期間，俞先生每星

期所寫給我的信，聚積起來高可盈尺，這裏面不知有多少資料，借因我迭次逃難，散失殆盡，殊覺悵然！世事滄桑，故舊相繼凋謝，往年偕同上陽明山謁墓的老友，今年又少了一個陳震亞兄，濡筆至此，愴然欲泣！悲乎！

（選自中外雜誌廿一卷四、五期六十六年四、五月號）

